

“重写文学史”思潮述评

徐 敏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71)

摘 要: 学界对“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两个方向上展开:其一,将该思潮置于学科史层面予以探讨和学术定位;其二是将之置于 80 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作考察,并与 80 年代现代化文学叙事和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参照。这样的视角对个案的复杂性有所忽略。对“重写文学史”研究,应以深度影响当下文学史写作的“观念”为单元,考证一系列新时期文学学术思潮个案,探索各个文本之间的相应或对照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批评标准、理论导向和价值关怀作出评判。

关键词: 重写文学史 述评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853(2013)02-073-04

1988 年 7 月,《上海文论》第 4 期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的论题。该专栏主持人陈思和、王晓明开宗明义提出:开设这个专栏,是为了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目的在于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1]专栏历时一年半,发表了一批具有论辩与重估色彩的论文,对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系列经典作家、作品、理论思潮,进行了重新解读。专栏的开设引起了学术界热烈的反响。《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评论》、《文艺争鸣》、《文艺报》等刊物都刊载了不少“重评”与探讨文章。

“重写文学史”讨论并非是发生上海一地的孤立事件,王晓明就把 1985 年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提出的“20 世纪中国文学”视为“重写文学史”的序幕。王晓明说,“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们第一次看清了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既成格局的重要意义”。^[2]而置于新时期历史的纵轴上,“重写文学史”则被理解为重新解释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尝试与努力,陈思和说,“‘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不是随意想像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上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3]可以说,“重写文学史”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响,又是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必然。

学界对于“重写文学史”的探讨,主要在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将“重写文学史”思潮置于学科史层面并予以定位。温儒敏等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从学科评论的高度,回顾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前沿性的课题。”^{[4] [P1]}“重写文学史”即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被详细梳理。该书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就分别阐述了 80 年代的“重评”、“文学史整体观”、“80 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的当代文学及其学科建制”以及“‘重写文学史’与 90 年代的学术进展”等论题。在姜涛、贺桂梅等几位青年学者探索议论中,对“重写文学史”之于现代文学学科建制的特殊意义及其内在脉络也有论说。

“重写文学史”探讨的另一方向是将之置于 80 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如何“借助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重建文学史的主体性,参与 80 年代现代化文学叙事和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文化思潮”。杨庆祥的博士论文《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研究》即从这一角度,结合钱理群、王晓明、陈思和、毛时安等当事人对这一思潮前后相关事件的口述,考察了不同社会文化话语与“重写文学史”话语之间

收稿日期:2012-12-10

作者简介:徐敏,女,1974 年生,江苏涟水人,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2012 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写文学史’研究——以学案为考察中心”(编号:2012SJD750019)。

的关系,并分析了“重写文学史”研究参与主体的知识构成、美学旨趣和行为实践。

“重写文学史”专栏发表的文章,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两类。一类是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以此来讲“一个比较大的文学史问题”。如对赵树理方向、柳青的《创业史》、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小说的再评。在这一方向上的讨论,其中一个值得再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界定经典文学的标准。

标准的讨论,背后有隐隐约约的“本质主义”的暗影。如今的学者,经由解构主义的陶冶,对经典构成的文化质素已经具备了质疑与还原的能力,普遍重视经典生成过程中的复杂因素。但是,在承认事情的复杂性时,也要坚持在价值判断上的“简单”,即“好的文学”(或经典文学)并不是一个伪命题。考察事情的复杂方面只是对我们做出价值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已。汪晖在《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指出:“在多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理念和现代虚无主义的各种理论姿态瓦解了任何重建统一的价值和规范的时候,以批判性为其特征的各种理论开始意识到在它们所进行的激烈的批判过程中,批判性本身正在悄悄丧失活力。因此,需要重新确认批判的前提。”

文学研究,其价值标准不脱真、善、美三个范畴。但这三姊妹并非任何时候都联袂而来,甚至这三者之间会发生或明或暗的矛盾冲突。这种情况下,批评家将如何安排其价值序列?1980年代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人们对以善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批评心怀顾虑,往往更推崇真与美。聚焦于个人时,注重其心理、欲望的表达是否真实;关注表达形式时,推敲其语言技巧是否完美。这样,善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有时候甚至沦为一声无用的吆喝。对于这样的价值取向,我深怀疑虑。特别是看到在一个大的社会语境中,对真实欲望表达的肯定已经有意无意间触犯了伦理底线,这更有重提伦理批评的必要,肯定善的核心地位。因为只有在前善的前提下,真与美才能获得更为深厚的人性和社会内容。因此,不关注伦理道德的批评会降低读者的道德标准。正如王晓明、陈思和、洪子诚诸人对作家意识与心理的推敲,这种推敲的背后是一种敏锐的道德关怀在起作用。艾·阿·瑞恰慈曾引威廉·布莱克预言诗《耶律撒冷》时指出:

与人为善者行事必然注重细微末节,恶棍、伪君子和马屁精才讲什么一般的善。而艺术家乃是“细微末节”方面的专家,而且以此自居的艺术家不大或者毫不重视一般规律,他发现在客观实践中它们过于粗略,因此无从辨别有价值者及其反面。出于这层缘故,道德家总是倾向于不信任或无视艺术家。可是生命的良好品行只会来自对反应的良好梳理,那些反应极其微妙,不涉及任何笼统的伦理格言原则,道德家对艺术的这种忽略几乎意味着他们没有资格谈论道德。^{[5] (P52)}

专栏文章的另一类型是对整个的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的纵向的分析,例如李劫、徐麟、夏中义等人的文章。托·斯·艾略特曾指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不仅有自己的创作习惯,而且还有自己的文学批评的习性。与创作天才方面的缺点和局限相比,本民族文学批评习惯方面的缺点和局限,更容易为人忽视。”^{[6] (P1)}在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至今引人注目的往往是关于作品评价标准的“重估”问题,而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对我们的“批评习惯”进行考察的文章还关注得不够。在《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就有一篇极具理论眼光与现实针对性的文章——夏中义的《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夏中义指出,中国是在特定历史格局、处于功利性的亟需才高扬别、车、杜的,这符合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的需求。“别、车、杜与中国文学思潮的关系并不是那种纯学术性引证与被印证的关系,相反,这两者的亲和性是以深刻的历史背景、文学观念及其政治契机的高度契合为基础的。”^{[7] (P159)}这也导致别、车、杜在中国文坛的“变形”。变形之一,就是倾向于把别、车、杜看成是铁板一块的、自觉实践政治使命的现实主义集团。夏中义认为,这一看法与事实不符。别、车、杜基本上是一个由历史追认的思想派别,而不是在生前结盟的俄国“三家村”。他指出:

别、车、杜在现实主义美学方面倒是互为源流的,但还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系统思维意义上的、方法统一、结构严整的美学体系。别、车、杜在合力构筑自然派美学大厦过程中是有分工的:假如说别氏率先提供了观念框架,车氏随后奠定了方法基石,那么,杜氏的应用性批评则像瓷砖装饰了墙体。但这一分工又是很偶然的,它并不受制于总设计师的整体蓝图,事实上,当时俄国也没有总设计师。故别、车、杜美学给人的总体印象,与其说像一座格局典雅、结构沉稳、保存完好的宫殿,不如说是一堆气度非凡、轮廓粗放、裂缝累累的遗址。^{[7] (P160)}

这里谈到的现象不仅存于建国初到文革前,在我们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历次大规模引进过程中,总会出

现此类情形:大多数被后来所追认的“思潮”、“派别”,其间成员并非有意“结盟”,其差异之大远远超过了我们想象的程度。而我们往往是从意识形态层面有选择地接受。可以80年代流行国内文学界的“新批评派”为例。吴鲁芹在《英美十六家》中与华伦(Austin Warren)有如下一段叙述与对话:

“那么你们的‘新批评’是怎么回事?”华伦从我问话的口气,知道我一定也相信“新批评”是一个学派。事实并不如此。他笑笑说,“天下哪里去找这么一张大床,睡得下这么多人?我随便举几个名字给你听听。I. A. Richards, T. S. Eliot, Allen Tate, R. P. Blackmur, Yvor Winters, Kenneth Burke, 我的老师 J. C. Ransom, 我的好朋友 Cleanth Brooks, 再加上我。这一伙人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主张对文学作品要认真地仔细地打量一番。如何去打量就各有各的路数了。比方说艾略特和 Winters 都是你所说的‘新批评’派,但是艾略特更接近可以做他祖父的 Matthew Arnold, 而 Winters 接近 Irving Babbitt 的程度,远超过他接近 I. A. Richards, 后者是所谓‘新批评’派中人,前者并不是,我的朋友 Brooks 呢,我觉得某些方面他接近两百年前的柯立治(柯勒律治),更甚于他接近 Ransom 的程度,请问你怎么去解释?”

华伦说把这一伙人一古脑儿归入“新批评派”,事实上根本没有去读一下 Ransom 写的那本《新批评》(New Criticism)。他在书中指出批评家各路英雄,都各有一套理论,而且都自以为是,他是对谁都不同意,华伦说“一个名词都要有所指,而‘新批评’一词则无所指,或者是所指的对象太多,不管怎么样,称之为‘派’是不通的。”^[8](P233-234)

这段话道出了我们不太关注到的“派”的另一面。常见的“一统”看法,一方面可以抽象地对其宣扬的某条原则进行放大,进而扩大其影响力;另一方面,在扩大其影响的时候,又易以简略、疏忽的态度处理纷繁复杂的学术问题。这种误读,背后的动机又往往与我们引进时的现实动力密切相关。这种现实动力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尤为明显。这就造成了学术的沟通、交流往往潜在地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但又打着纯学术的幌子,以至于真正的学术中充满隐秘的政治暗语,从而使自身的学统意识形态化,也用这种斑驳的色调涂抹对方的面相。当对方不再为我们的意识形态语境需要时,双方的“蜜月期”即告终结,而对象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反而隐晦不彰。王晓明在文章中也指出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化就显现出强烈的务实倾向,其核心观念都是针对现实的社会危机而设立的,很少关心诸如个人和世界的存在依据之类的“玄”的问题。即如“审美”这一类本来“非历史性”的观念,在中国语境中也会越来越被“历史化”和“政治化”。余英时在《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中也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史的最大特色便在于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显然分离为二。从中国学界对待西方思潮的态度来看,往往倾向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接受,而不是纯正学术思想的探讨。^[9](P173)当然,这只是就历史的一个消极方面观察而言,学统并未因此而断绝,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何我们还能借助余英时、夏中义等人的学术眼光观察到学术史的这一面向。

目前围绕专栏文章对“重写文学史”展开的讨论,除了对以上两类性质的文章的内蕴有所忽略外,在方法与思路上也需调整。

探讨“重写文学史”思潮运动,当然要重视1988-1989年发表在《上海文论》上的“主持人的话”及相关专栏文章。但不能以此划定范围。因为《上海文论》的“主持人的话”及相关专栏文章,只是序幕,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在90年代以后才逐渐显露。因此,必需将在这一思潮带动下一代学人的持续思考与写作实践纳入“重写文学史”的研究视野。

其次,在处理文学史学基本问题时,学界倾向于以“以论带史”的方式来形塑概念的策划与发展的脉络,而相对忽视具体的学人在运用同一“术语”时内涵的差异。

还原某一观念提出的时代语境,不仅仅对观念的提出与策划的语境的还原,更在于这一观念在每一位当事人的学术轨迹中的逻辑还原。无论是两位主持人,还是那一批专栏文章,都显示了不同的学术理路与价值取向,但任何一篇文章,都不能代表“重写文学史”的总体观点,至多显示某方面的倾向而已。在这些文章所显示的不同方向上,从来都有驳杂而辨异的声音。要想对这一由众多学人参与讨论的“思潮”加以逻辑化,在突出其“主流”时无疑要以牺牲其多元化的声音为代价。因而,用“以论带史”的方式来考察,虽然能够部分看到这一思潮与80年代“意识形态”话语的互动关系,但讨论方向与问题的引领方式依然存在偏颇。譬如在对“重写文学史”的若干关键词的梳理与理解上,相关研究就未能清晰呈现其“复杂”与“多样”。

在谈到“重写文学史”提倡的“历史的、审美的研究方法”时,有研究者提出,虽然陈思和、王晓明等提到了“历史的审美的”研究方法,但是,“历史”在此不过是“虚晃一枪”,其重心还是落在“审美”上面。“在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之间,‘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似乎更倾向于美学标准并对历史主义的提法表示了怀疑”,“这一观点,也正是文学界倡导的‘文学自觉’、‘回到文学自身’等文学本体论观念在文学史研究中的反应。”^{[10] [P66]}事实上,虽然陈思和、王晓明二位学者坦陈在专栏倡言的“审美”具有政治反叛的意义,但落实到各人的具体批评实践中,却不可如此狭窄地理解他们的“审美批评”。在他们两人的具体文学批评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对人性丰富的洞察。王晓明对张天翼讽刺文学的研究以及陈思和对人性中恶魔性因素的勘察、对叙事立场的关注,都可以看出其文学审美从来离不开对人生的基本关怀。

再如对待五四文学的态度,如果仅仅以 89 年为界来考虑,那么,我们很难完整呈现“重写文学史”参与者的深入思考。陈思和在访谈中说道,在 88 年以前,他和钱理群(包括赵祖武、王晓明)等人的看法都倾向于将五四文学和当代文学对立起来看,认为五四文学比当代文学好,当代文学没有真正继承五四文学的传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这一传统。但是,如果联系陈思和后来提出的一系列文学史观念如战争文化心理、民间文化形态等来看,显然已经突破了以上较为简略的二元对立的思路,更为注重对当代文学逻辑生成的考辩与认识,其价值判断基于更完整的认识。而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则更明显地表明他对五四文学与当代文学关系的深入理解。

关于“重写文学史”,现今的回顾已将其在历史中定格。作为一个“历史中间物”,它已成为有些研究者间接证明自己的研究合理性的潜在对立物。于是我们不时在刊物上看到有些论者在强调自己的文学史研究时注重“历史遗址”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轻松地将“重写文学史”置于批判的位置上。这种论证方法,“先为臆造界说,而后此所言,即以望文生义”(严复语)。一如米兰·昆德拉所提醒我们的,经历过政治灾难和人道灾难的人们不可仅从这一维度来衡量我们的生活;我们也不可将一个原本复杂开放的学术问题缩减为一个口号,一个标语,一个简单的姿态。

基于以上考虑,对“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深入研究,应以扎实学案为纲要,以深度影响当下文学史写作的“观念”为单元,考证一系列新时期文学学术思潮个案,探索各个文本之间的相应或对照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其批评标准、理论导向和价值关怀作出评判。

参考文献:

- [1] 陈思和、王晓明. 主持人的话 [J]. 上海文论, 1988 (04).
- [2] 王晓明. 主持人的话 [J]. 上海文论, 1989 (06).
- [3] 陈思和. 文学评论家 [J]. 1989 (02).
- [4] 温儒敏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5] 艾·阿·瑞恰慈. 文学批评原理 [M]. 杨自伍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2.
- [6] 托·斯·艾略特. 艾略特文学论文集 [M]. 李赋宁译注.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4.
- [7] 夏中义. 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7.
- [8] 吴鲁芹. 英美十六家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 [9] 余英时.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04.
- [10] 贺桂梅. 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 [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启 煜

A Review on the Trend of “Re – writing the Literary History”

Xu Min

Abstract: The study of “re – 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by scholars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following two directions: 1. discuss and locate it in the level of history of academic discipline; 2. Observe it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1980s “ideology emancipation” and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literary nar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ideology in 1980s. These observations neglected the complexity of individual cases. The study of “re – 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should take the “concepts” which have deep influence on current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as unite, research a series of cases of literature academic trend in the New Period, explore the relevant or contrasting relations among individual texts. On this basis, the criteria for criticism, theoretic orientations and value cares should be evaluated.

Key words: re – 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review